

国际法院对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明价值的评估

孔令杰 刘聪聪*

摘要：当事国聘请的专家所出具的专家意见是国际法院认定争议事实依赖的一种重要证据。专家的资质、专长和独立性以及专家意见所依据的信息和数据及其处理方法和产生的结论是影响专家意见证明价值的主要因素。鉴于专家的聘请事宜由当事国主导，法院不会强制要求专家必须在资质、专长和独立性等方面满足某些特定的条件。对于可能影响专家意见证明价值的部分因素，法院尚未发表一般性的观点或具体意见。法院可在司法实践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回应当事国的争辩点，也可就评估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明价值的方法发表更具针对性的意见。

关键词：国际法院 当事国聘请的专家 专家意见 证明价值 专家证据

近年来，在国际法院（下称法院）审理的诸多案件中，为了更好地证明本国主张的事实，特别是科学和/或技术密集型的事实，当事国大多聘请了专家，甚至聘请案件所涉专业领域的多名专家。^① 当事国聘请这些专家出具专家意见，向法院提交专家报告证据，并在必要时安排专家出庭作证或者以律师身份参与法律程序。^②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对国际诉讼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专家意见作为证据将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中。^③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院在当事国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和权重等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④ 仅在少数案件中直接评判这类证据的证明价值，且尚未说明评估的一般原则和总体做法。

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问题是国际法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起初，学界一方面批评法院处理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的消极态度和不良做法，包括在认定事实过程中忽略、拒绝使用或者曲解当事国提交的专家意见证据，允许专家以律师身份参与诉讼，拒绝当事国提出的质询专家的请求

* 孔令杰，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聪聪，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VHQ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See Anna Riddell and Brendan Plant, *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09), p. 339.

② See Anna Riddell and Brendan Plant, *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 340.

③ See Anna Riddell, "Scientific Evid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2009) 20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29, p. 230.

④ 这些处理方式可归为4种：一是不考虑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典型案件是“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二是考虑了专家证据，但是认为回应当事国诉求/作出判决不需要依据这些证据确立事实，典型案件是“大陆架划界案”（突尼斯/利比亚），“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匈牙利/斯洛伐克）等；三是认为需要确立事实，但是有其他关键性证据或者多种类型的证据并存，法院未就专家证据的证明价值等发表意见，如“石油平台案”（伊朗诉美国）；四是法院对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的关联性、权重、证明价值作出评判，如“南极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参加）以及“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案”（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公路案”（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

等；另一方面则建议法院更加积极地处理、使用当事国提交的专家证据，并不断改进审判程序。^① 随着法院开始积极应对当事国专家意见的证据问题，学界关注的重点转向法院查明事实的新变化和新问题，包括总结法院在审判程序上作出的改进，阐明法院评估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权重的方式、方法，剖析法院用来审查当事国国内立法、措施或决策的客观审查标准，^②指出法院做法仍旧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方向。^③ 其中，对于法院如何评估当事国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现有研究主要讨论了当事国和专家的立场和态度，专家的出庭身份对证明价值的影响。^④ 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成果专门分析专家自身和专家意见的有关情况对专家证据证明价值的影响，这包括专家的资质、专长和独立性以及专家报告所依赖的原始信息和数据的来源，收集方式、时间、地点、工具，处理和分析的方式、模型，以及最终形成的专家意见是否合适等。与当事国提交的其他类型的证据不同，当事国专家意见由专家出具，并且是一份科学意见。^⑤ 上述因素对于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明价值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细查深究的国际法问题。

本文将重点研究国际法院评估当事国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所关涉的5方面的问题，目的是便利法院查明争议事实、保障良好司法、提高司法效率，同时也可帮助当事国了解法院评估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的偏好。其中，第一和第二部分讨论专家的资质、专长和独立性对于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明价值的影响，第三、第四、第五部分讨论原始信息、数据的采集和获取、处理和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证明价值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灵活性既是国际裁判机构最基本的属性之一，^⑥也是国际争端解决的核心要素。^⑦在事实查明方面，这一属性突出表现为大部分司法和仲裁机构查明事实和评估证据的规则往往比较笼统。^⑧《国际法院规约》（下

① See Anna Riddell, "Scientific Evid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p. 232; Anna Riddell and Brendan Plant, *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p. 339-358; Bruno Simma,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Scientific Expertise", (2012) *ASIL Proceedings* 230, p. 232; James Gerard Devaney, *Fact-finding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73-88, 217-230, 245-247; 何田田:《论国际法院与专家证据——以1994年国际法院“陆地和海洋边界案”为视角》,载《国际法研究》2019年第2期,第12页。

②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4, p. 254, para. 67; 罗文正:《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中的审查标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29页。

③ See Guillaume Gros, "The ICJ's Handling of Science in th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Case: A Whale of a Case?", (2015) 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578, pp. 578-620; Makane Moïse Mbengue, "Scientific Fact-finding at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 Appraisal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Whaling Case", (2016) 29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29, pp. 529-550; Malgosia Fitzmaurice and Dai Tamada,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Significance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ICJ Judgment* (Brill Nijhoff, 2016); Loretta Malintoppi, "Fact Finding and Evidence Before the ICJ, Notably in Scientific-Related Disputes", (2016) 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421, pp. 421-444.

④ See Lucas Carlos Lima, "The Evidential Weight of Experts before the ICJ: Reflections on th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Case", (2015) 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621, pp. 621-635; Shotaro Hamamoto, "Paradoxical Role of Experts in th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Case", (2016) 59 *Japanes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345, pp. 345-359; Joan E. Donoghue, "Expert Scientific Evidence in a Broader Context", (2018) 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379, pp. 379-387.

⑤ See Anna Riddell and Brendan Plant, *Evidence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 343.

⑥ See Brendan Plant, "Expert Evidence and the Challenge of Procedural Reform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018) 9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464, p. 465.

⑦ See Brendan Plant, "Expert Evidence and the Challenge of Procedural Reform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p. 466.

⑧ See Durward V. Sandifer, *Evidence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nd edn, 1975), pp. 5-34; Shabtai Rosenn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1920-2005*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4th edn, 2006), p. 1039; Andreas Zimmermann,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n., 2012), Evidentiary Issues, pp. 103-106; Brendan Plant, "Expert Evidence and the Challenge of Procedural Reform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pp. 465-467.

称《规约》)和《国际法院规则》(下称《规则》)的相关条款在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证明价值评估的问题上不能直接给出明确的答案,这要求我们细致地研究国际法院的相关司法实践及形成的国际判例。^①

一 当事国聘请的专家的资质和专长

“专家”(expert)一般被定义为拥有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技能或者技术的人。^②换言之,在某个或者某些特定的专业领域拥有资质或具有专长,是专家与非专家的基本区别。^③在国际诉讼程序中,为了在相关的争讼事实上获得法院的支持,当事国往往会主动聘请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请他们出具专家意见,甚至出庭作证。聘请谁来做专家显然是由当事国自己来决定的。当然,它也要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④从国际法院的实践来看,一方聘请的专家所具备的资质和专长,经常成为另一方挑战和质疑的事项。

针对专家的资质,一方当事国往往指责另一方聘请的专家没有资格或不够资格针对某个争议的事实问题以专家身份发表意见。例如,在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参加的“南极捕鲸案”(下称捕鲸案)中,日本指责澳大利亚聘请的专家马克·曼格尔(Marc Mangel)先生只是一位待在象牙塔里的大学教授,不是国际捕鲸委员会(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的成员,就“什么是科学研究”这一案件的争议焦点所提出的标准过于学术化,根本不能适用于案件所涉的JARPAII项目。^⑤澳大利亚则回应称,曼格尔先生有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就科学研究活动提供建议的丰富经验。对于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他非常适合提供独立、实用的意见。^⑥

针对专家的专长,当事国往往辩称另一方聘请的专家所发表的意见超出了其自身的常规领域。例如,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领土和海洋争端案”(下称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的庭审阶段,尼加拉瓜指出,哥伦比亚聘请的专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博士曾在2007年圭亚那诉苏里南“海洋划界仲裁案”的庭审中甚至无法给出“大潮低潮面”(low-water spring)这

① 与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密切相关的案件包括:“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大陆架划界案”(突尼斯/利比亚)、“大陆架划界案”(利比亚/马耳他)、“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匈牙利/斯洛伐克)、“卡西基利/塞杜杜岛案”(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海洋划界和领土争端案”(卡塔尔诉巴林)、“石油平台案”(伊朗诉美国)、“乌拉圭河纸浆厂案”(阿根廷诉乌拉圭)、“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空中喷洒除草剂案”(厄瓜多尔诉哥伦比亚)、“南极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参加)以及“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案”(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沿圣胡安河修建公路案”(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

② See K. Anders Ericsso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tise and Expert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

③ See K. Anders Ericsso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tise and Expert Performance*, p. 3; Michael Young and Johan Muller, *Knowledge, Expertise and the Professions* (Routledge, 2014), p. 2.

④ 正如国际法院法官杰拉德·菲茨莫里斯爵士(Sir Gerald Fitzmaurice)所言,“当人们向律师、医生、建筑师或其他专家咨询时,就会被认为接受了下述可能性,即被咨询的专家在出具意见时可能会犯错或者这位专家所做的工作不够完美。和所有人一样,专家难免也会犯错误。”See *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mbodia v. Thailand)*, Judgment of 15 June 1962, Separate Opinion of Sir Gerald Fitzmaurice, I. C. J. Reports 1962, p. 58.

⑤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Oral Proceedings, 2013/15, p. 47, para. 12.

⑥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Oral Proceedings, 2013/19, p. 39, paras. 40 – 41.

一专业术语的定义，并据此辩称水道测量学（hydrography）不是他的常规专业领域（norm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鉴于本案的争议点之一，即圭塔苏埃诺礁（Quitaeño）中是否存在地物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情况，这恰恰属于水道测量学领域的问题，史密斯博士不应该就该问题出具专家意见。^①对此，哥伦比亚辩驳道，^②史密斯博士承认自己不能定义“大潮低潮面”这一专业术语并不意味着他不精通海洋法上与地理、科技相关的问题。^③

国际法院很少直接干预当事国之间有关专家资质和专长的争议或在判决中对此发表意见。值得一提的是“西南非洲案”（埃塞俄比亚诉南非，利比里亚诉南非）。由于双方当事国的代理人和律师在对方当事国质询证人（也包括专家）的过程中反复针对证人的资质、专长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法院不得不发表了看法。法院明确指出，如果一位专家能够证明自身在某些领域拥有专业知识，那么便可称其为“专家”。^④除此以外，法院没有说明其他可视为满足资质要求的条件与标准。就专家超出自身专业领域发表意见所引发的争议，法院一方面强调这是评估专家意见证明价值时需要考虑的一项因素；另一方面则表示专家可以在其非常规领域发表意见，只要他能够证明自身在该领域拥有超出常人的专业知识。^⑤但是，法院并未说明具体的评判方法。

事实上，法院会考虑专家的资质和专长，尤其会考虑专家是否超出自身常规专业领域发表专业意见，以及是否有资格针对某个争议的事实以专家身份发表意见等情况。然而，法院往往不会把它当成评估专家意见证明价值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法院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的做法或许可以有所启发。虽然该案中的专家史密斯博士被指控不精通水道测量学，但法院仍旧认为，由于《史密斯报告》是在实地考察和科学评估基础上形成的，^⑥因而是判定“圭塔苏埃诺礁中是否存在地物在高潮时高于水面情况”这一问题的重要证据。这或许可以表明，相较于专家的资质、特长，法院更为关注的是专家意见所依据的数据和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评估方法的科学性等与专家意见本身更为密切关联的因素。

《规约》和《规则》都没有对当事国聘请的专家的资质和专长等事项作出明确的规定。^⑦是否聘请专家、聘请谁做专家等事宜皆属当事国自行决定的事项，法院一般不对这些专家的资质和专长提出一般性的判断标准。可以说，这是当事国的自由或权利。另一方面，当事国也要自行承担与聘请专家相关的风险，包括对方对本国专家资质和专长的挑战、专家出错、法院不考虑本国

① 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Oral Proceedings, 2012/14, p. 36, para. 12.

② 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Oral Proceedings, 2012/17, p. 13, para. 33.

③ 当事国对专家专长的类似指责还出现在纸浆厂案中。See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Argentina v. Uruguay)*, Oral Proceedings, 2009/21, pp. 13, 24–25, paras. 4, 24; Oral Proceedings, 2009/22, p. 47, para. 14.

④ See *South West Africa (Ethiopia v. South Africa)*, Oral Proceedings, 1965/3 (Volume X), p. 515; Oral Proceedings, 1965/4 (Volume XI), pp. 166, 604.

⑤ See *South West Africa (Ethiopia v. South Africa)*, Oral Proceedings, 1965/3 (Volume X), p. 515.

⑥ 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2, p. 644, para. 36.

⑦ 《国际法院规则》第57条、第63条分别对当事国提交专家证据的方式以及聘请、传唤专家参与庭审的权利作了规定。除此之外，《规则》还笼统规定了专家参与庭审的诸多方面，包括专家需要宣读的誓言、审查和讯问专家的方法、专家核对证词的权利以及专家参与庭审是否需要安排翻译等。参见《国际法院规则》第64条第2款，第58条第2款以及第65条，第70条以及第71条第5款。另外，上述两份文件也对法院的权力和权限作出规定。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43条第5款、第51条以及《国际法院规则》第62条第2款，法院不仅可以安排鉴定人出席诉讼，也可以审讯鉴定人或者向鉴定人“提出任何切要有关之诘问”。然而，关于法院应当如何评估当事国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和权重，上述文件却未作任何规定。

专家的意见等。法院虽然无权干涉或干预当事国聘请专家的有关事项，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不可从维护良好司法、提高司法效率、便利认定争议事实的立场出发，对关涉当事国聘请专家的有关事项进行适当引导。如今，国际法院所处理案件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① 为便利法院和法官评估当事国专家意见证据，改善当事国在聘请专家过程中的某些不当做法，法院通过适当方式对相关事项进行引导就显得尤为必要。其中，在案件判决等法律文书中发表一般性看法或者评论意见便是一种可行且有效的引导手段。例如，不少当事国选择让本国聘请的专家以律师团成员的身份参与法律程序，这导致当事国无法在庭审过程中围绕专家证据对这些专家进行询问。针对这种做法，法院在纸浆厂案中发表了一般性意见，表示希望当事国专家以专家而非律师身份参与法律程序。^② 自此，当事国便几乎不再采取上述不良做法。^③ 类似地，法院也可以在必要情形下就专家的资质或者专长问题发表一般性看法，以指引和规范当事国在聘请专家上的做法。

二 当事国聘请的专家的独立性

当事国聘请的专家经常被称为“枪手”（hired gun）。^④ 当事国花钱雇佣专家，目的就是让他们从专业角度向裁判机构提供对本国主张事实有利的专家意见。在国际法院的实践中，当事国往往以对方专家不独立为由，挑战专家意见的中立性、客观性，并试图借此否定或削弱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

在过往案件中，关于专家的独立性，当事国往往提出如下几种质疑：一是专家相较于当事国不具有独立性，包括专家可能是当事国国内某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由当事国短期雇佣出具专家意见；二是专家与案件的诉讼结果有利害关系；三是专家在准备专家报告时曾与当事国国内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在纸浆厂案中，乌拉圭以阿根廷聘请的专家与阿根廷存在雇佣关系为由主张此类专家不具备独立性。^⑤ 与此同时，阿根廷以乌拉圭的专家与案件的诉讼结果存在利益关系为由指责乌拉圭聘请的这位专家不独立。^⑥ 类似的质疑还出现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和捕鲸案中。^⑦

在上述案件中，国际法院似乎根本没有理会这些指责，也没有对专家独立性的定义和判断标准等发表一般性意见。更甚者，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即便史密斯博士被指责不中立，在判定“圭塔苏埃诺礁中是否存在地物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情况”这一问题时，法院仍旧认为《史密斯报告》是最为重要的证据。^⑧

① 参见何田田：《论国际法院与专家证据——以1994年国际法院“陆地和海洋边界案”为视角》，第11页。

② See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Argentina v. Uruguay)*,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0, p. 72, para. 167.

③ See Loretta Malintoppi, “Fact Finding and Evidence Before the ICJ, Notably in Scientific-Related Disputes”, p. 435; Guillaume Gros, “The ICJ’s Handling of Science in th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Case: A Whale of a Case?”, p. 581. 在个别案件中，当事国仍然安排专家以律师身份参与法律程序。See Alan Boyle and James Harrison, “Judicia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Current Problems”, (2013) 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45, p. 271.

④ Evan Bell, “Judicial Assessment of Expert Evidence”, (2010) *Judicial Studies Institute Journal* 55, p. 55.

⑤ See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Argentina v. Uruguay)*, Oral Proceedings, 2009/19, p. 35, para. 6.

⑥ See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Argentina v. Uruguay)*, Oral Proceedings, 2009/21, p. 24, para. 23.

⑦ 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Oral Proceedings, 2012/14, p. 36, para. 12;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Oral Proceedings, 2013/14, pp. 23–26, 31.

⑧ 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2, p. 644, para. 36.

同样地,《规约》和《规则》在当事国所聘请专家的独立性问题上也没有明确要求。法院作为独立、客观的第三方,虽然在判断当事国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上有自由裁量权,但却不能要求当事国所聘请的专家必须具备独立性和中立性,在有关争端上不持既定立场,仅得从自身专业角度发表客观意见。曾有专家建议,国际法院应更新实践指南,对当事国聘请的专家的独立性提出明确的要求,将当事国聘请的专家区分为“咨询专家”(consulting experts)和“独立专家”(independent experts)两种类型,在提出书面专家意见证据时提交一份独立性声明,说明专家与案件程序相关的任何利益关系等。^①但上述建议妨碍了当事国自行决定聘请专家事项的权利和自由,似乎也与国际争端解决的灵活性原则相悖。^②为了保障良好司法,尤其是便于法院查明和认定争议事实,本文认为,国际法院同样可以在判决等法律文书中发表一般性的意见或以评论意见的方式改善当事国的某些现有做法。例如,法院可以鼓励当事国聘请的专家就认定事实所涉的科学和技术问题仅从自身的专长角度发表专业性的意见。这显然有助于法院更加精准地确认双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具体争议点,进而更加准确地认定有关事实。^③

三 专家意见所依据的信息和数据

收集和获取原始信息和数据是专家意见形成的基础。在过往案件中,双方当事国曾多次围绕信息和数据的收集和获取等展开争辩。具体而言,当事国争论的焦点可以归纳为如下3方面。

(一) 信息和数据来源问题

在过往案件中,一方当事国经常会挑战对方当事国专家证据的信息与数据的来源问题,尤其是不同信源往往会带来不同争议。^④当事国聘请的专家出具意见所依据的信息和数据主要来源于4种渠道。

第一种是由当事国直接提供信息和数据。专家基于此种渠道获取的原始信息出具的专家意见经常被另一方当事国指责缺乏独立性。例如,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案”(下称某些活动案)中,哥斯达黎加聘请的专家科林·索恩(Colin Thorne)

^① “咨询专家”主要负责帮助当事国起草法律文书、应对诉讼;“独立专家”主要负责接受另一方当事国的质询和法院的提问,且不能参与当事国准备诉讼的过程,以保障他们的独立性和公正性。See James Gerard Devaney, “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Experts in Recent Case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p. 15 – 19,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519799 (last visited 25 February 2022).

^② See Brendan Plant, “Expert Evidence and the Challenge of Procedural Reform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pp. 464 – 472.

^③ 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双方当事国的专家各自站在有利于聘请国的立场上发表专业性意见,这使得法院能够依据双方当事国专家的共识确立事实。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2, pp. 642 – 643, 644 – 645, paras. 30 – 31, 36 – 37.

^④ 除了不同信源所引起的关注以外,当事国专家给出意见所依据的原始信息是否有确切的来源,特别是专家报告是否披露信息来源,同样是当事国挑战对方专家意见可靠性的一项重要理由。在捕鲸案中,澳大利亚曾多次强调日本雇佣的专家出具的书面专家报告没有提供脚注和参考文献。法院未直接回应澳方提出的此项质疑。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事实时依据的并非沃奥先生出具的这份书面报告,而是他在庭审阶段提供的口头证词。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Oral Proceedings, 2013/14, p. 25; Oral Proceedings, 2013/9, pp. 19, 29, paras. 23, 51; Oral Proceedings, 2013/20, p. 31, para. 82;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4, pp. 280, 283 – 284, paras. 180, 192.

在出具专家报告时参考了许多由该当事国提供的信息和数据，尼加拉瓜据此指责这份报告依据的信息既不中立也不可靠。^①此外，当事国还经常指责另一方当事国在向专家提供信息时有隐瞒行为。在某些活动案中，尼加拉瓜质疑哥斯达黎加向其雇佣的专家科林·索恩隐瞒修建公路的事实；在卡塔尔诉巴林“海洋划界和领土争端案”（下称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卡塔尔质疑巴林向其雇佣的专家卡尔顿长官（Commander Carleton）隐瞒一项不利证据，即英国一家公司于1977年出版的一份大比例尺地图。^②截至目前，法院还没有对通过第一种渠道获取的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等直接在判决中作出评价。根据既往司法实践，法院会考虑信息来源缺乏独立性或者当事国隐瞒信息等情况，但不会单纯基于上述原因而完全不考虑根据此种渠道获取的信息所出具的意见。^③

第二种是由专家自行获取，特别是当事国聘请的专家通过实地考察获取一手数据。根据不同案件情况，法院采取了不同态度。例如，在某些活动案中，尼加拉瓜指出哥斯达黎加聘请的专家科林·索恩进行实地考察的方式是“私人飞越争议领土上空”，而非实地深入争议区域考察是否先前存在连接圣胡安河和港头泻湖（Los Portillos/Harbor Head Lagoon）的天然水道，并指出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实地考察出具的专家意见不过是猜测。^④法院在确立事实时几乎没有考虑科林·索恩通过实地考察获取的信息或数据。相反，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法院却认为史密斯博士通过实地考察获取的与该问题相关的一手信息、数据是判定该问题最重要的证据。^⑤可见，法院在评估通过此种渠道获取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时，会综合考虑专家实地考察的不同情况，包括当事国雇佣的专家是否真正进行过实地考察，实地考察的过程是否全面、细致，评估信息的方式方法是否科学、严谨等。

第三种是来自第三方提供者的数据。对于通过此种渠道获取的数据和信息，提供者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十分重要。如果提供者缺乏权威，另一方当事国很有可能借机指责。例如在某些活动案的赔偿阶段，在确定气体调节功能（gas regulation services）的假定价值（putative value）时，哥斯达黎加提供的数据出自一份未经同行评审的硕士论文，遭到了尼加拉瓜的指责。^⑥但截至目前，法院在判决中还没有对依据这种渠道获取到的信息出具的专家报告进行直接评价。

第四种方式是由双方当事国共同采集的数据。在“卡西基利/塞杜杜岛案”（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中，对于1890年条约中乔贝河主航道是位于卡西基利/塞杜杜岛南侧还是北侧，纳米比亚

① See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Written Proceedings, Counter-Memorial of Nicaragua, p. 242, para. 5. 208.

② See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Written Proceedings, Counter-Memorial of Nicaragua, p. 117, para. 4. 64 (footnote 260);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 Oral Proceedings, CR 2000/9 (translation), p. 39, para. 24.

③ 在捕鲸案中，澳大利亚聘请的专家曼格尔先生在其第一份专家报告中明确指出这份报告的部分参考材料是由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法院并未仅基于此而舍弃这份专家证据。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Statement of Mr Marc Mangel (expert called by Australia), p. 339, para. 2. 2; 2013/9, p. 55;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4, p. 283, para. 190. 另可参见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2, p. 644, para. 36.

④ See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Written Proceedings, Counter-Memorial of Nicaragua, pp. 347, 349, paras. 6. 99, 6. 103.

⑤ 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2, p. 644, para. 36.

⑥ See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Compensation Phase, Written Proceedings, Rejoinder of Nicaragua on Compensation, p. 24, para. 2. 42.

和博茨瓦纳两国一直存有争议。为解决上述争议，双方当事人分别于1948年和1985年共同委派人员、专家展开联合调查。几份调查报告都一致认为卡西基利/塞杜杜岛北部支流为乔贝河的主航道。在该案判决中，法院两次提及上述报告，用来辅助证明自身关于1890年条约第3条第2段的解释结论，即乔贝河的北部河道为该河在卡西基利/塞杜杜岛周围地区的主航道。^① 法院之所以如此重视上述调查报告，部分原因在于上述调查是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实施的，能够体现双方当事人的合意。^②

（二）信息和数据的收集方式和过程

信息和数据的收集方式和过程对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有着直接的影响。国际法院的相关司法实践表明，信息的收集方式和过程主要涉及如下3方面的问题。

第一，收集信息的技术标准、方法、模型。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以及“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公路案”（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中，当事国曾就收集信息的技术标准、方法、模型等产生争议。^③ 法院尚未单纯基于收集信息的技术标准、方法、模型等肯定或者否定某一项专家证据。但这些因素会对当事国专家意见结论的准确性产生一定影响。

第二，收集信息的时间、地点和数量。某些待证事实对于原始信息的收集有时间、地点等方面的要求，例如需要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采集信息，以及需要符合一定要求的样本数量等。例如，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在判定“圭塔苏埃诺礁中是否存在地物在高潮时高于水面”这一问题时，法院在判决中直接明确表示，很多年前进行的调查与解决该问题无关，与之相关的是当今的证据（contemporary evidence）。^④ 据此，法院没有考虑尼加拉瓜提交的多项历史调查和海图证据。^⑤ 再如，在修路案中，由于收集信息的地点不符合要求，法院没有考虑尼加拉瓜出具的一份名为《环境诊断评估报告》（Environmental Diagnostic Assessment）的证据。^⑥

第三，收集信息的仪器、设备、工具。当事国也曾因收集信息的仪器、设备、工具等是否合适产生争议，包括其准确度、先进性等。在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史密斯博士在其报告中将圭塔苏埃诺礁中的地物高于平均海平面（mean sea level）的距离精确至毫米。鉴于史密斯博士使

① See *Kasikili/Sedudu Island (Botswana/Namib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99, pp. 1072, 1096, paras. 42, 80.

② *Kasikili/Sedudu Island (Botswana/Namib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99, p. 1096, para. 80.

③ See *Construction of a Road in Costa Rica along the San Juan River (Nicaragua v. Costa Rica)*, Written Pleadings, Reply of Nicaragua, pp. 105 – 106, para. 2. 127;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Oral Proceedings, CR 2012/9, p. 51, para. 33;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 Oral Proceedings, CR 2000/14, p. 41, para. 19.

④ 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2, p. 644, paras. 35 – 36.

⑤ 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2, p. 644, para. 36.

⑥ 在该案中，尼加拉瓜依据《环境诊断评估报告》主张修路工程正在危害流入圣胡安河的支流的水质量及生活在这些支流中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而这些支流所受到的危害的叠加效果会直接危害圣胡安河本身。对此，哥斯达黎加辩称，这份证据不能表明修路工程对圣胡安河本身具有重要影响。报告的样本取自圣胡安河流经哥斯达黎加境内的小支流，依据这些样本得出的结论不能适用于更宽的圣胡安河本身。法院完全接受了哥斯达黎加的抗辩，认为这份报告只能表明“道路的修建会局部影响哥斯达黎加境内流入圣胡安河的细小支流的水质量及生活在其中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群”，上述结果不会“迁移至平均河宽将近300米的圣胡安河本身”。See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and Construction of a Road in Costa Rica along the San Juan River (Nicaragua v. Costa Ric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5, pp. 735 – 736, paras. 209 – 210, 212.

用的测量工具不能达到如此精准的程度，尼加拉瓜以此为理由质疑《史密斯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① 国际法院尚未对此发表任何看法。

（三）难以或无法收集必要的信息

原始信息可能是难以甚至是无法收集或获取的。譬如，在空中喷洒除草剂案中，由于除草剂具有很强的易挥发性，萨尔瓦多难以收集一手信息来证明哥伦比亚的喷药活动对萨尔瓦多造成了诸多伤害。^② 又如，在纸浆厂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以及修路案等案中，^③ 案件争议地点在另一方当事国的领土范围内，这也使得原始信息的收集工作变得异常困难。

本文认为，在这些情况中，法院可综合考虑案件的情况，明确是否有必要采取措施。在一些情形下，当事国为了掩盖自身证据的薄弱，会以原始信息难以收集为由要求法院在权衡证明责任、评估证据等方面作出考虑。在另外一些情形下，难以收集的部分原始信息可能不会对判决产生实质影响。那么，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法院便无需采取措施。法院在纸浆厂案中的处理方式值得借鉴。在该案中，阿根廷主张，双方当事国在事实证据的获取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博特尼亚（Botnia）纸浆厂位于乌拉圭境内，相较于乌拉圭，阿根廷在证据的获取方面处于劣势。^④ 法院在判决中直接否定了阿根廷的上述主张：“阿根廷本身提供了许多事实信息，并且乌拉圭在案件不同阶段提交的材料都已经提供给阿根廷或者可在公共领域获取。因此，法院并不认为阿根廷处于证据获取的弱势。”^⑤ 在确有必要采取措施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在权衡证明责任、评估证据时考虑这一情形，降低证明标准。例如，在科孚海峡案（英国诉阿尔巴尼亚）中，阿尔巴尼亚对其领水实施的排外的领土控制导致英国无法获取到证明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法院不得不允许英国借助事实推定和间接证据来证明有关事实。^⑥ 当然，国际法院也可以行使《规约》赋予的权力，聘请专家收集原始信息，并出具专家意见。在科孚海峡案以及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海洋划界案（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中，法院聘请的专家收集的信息和据此出具的专家意见在帮助法院认定事实方面都起到了关键作用。^⑦

① 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Oral Proceedings, CR 2012/9, p. 50, para. 32.

② See *Aerial Herbicide Spraying (Ecuador v. Colombia)*, Written Proceedings, Reply of Ecuador, pp. 252 – 253, para. 3. 142.

③ See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Argentina v. Uruguay)*, Oral Proceedings, 2009/20 (translation), p. 11, paras. 17 – 18;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Oral Proceedings, CR 2012/9, p. 50, para. 31; *Construction of a Road in Costa Rica along the San Juan River (Nicaragua v. Costa Rica)*, Written Proceedings, Counter-Memorial of Costa Rica, pp. 84 – 85, para. 3. 61; Written Proceedings, Rejoinder of Costa Rica, p. 19, para. 2. 16.

④ See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Argentina v. Uruguay)*, Oral Proceedings, 2009/20 (translation), p. 11, para. 17.

⑤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Argentina v. Uruguay)*,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0, pp. 89 – 90, para. 226.

⑥ See *Corfu Channel Case (United Kingdom v. Alban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49, p. 18.

⑦ 在科孚海峡案中，英国主张雷区是在阿尔巴尼亚的默许下布置的，并提交了大量证据予以证明。为了确定阿尔巴尼亚是否有可能从其海岸观察到有人在布置雷区，同时也为核实与补充英国提交的诸多证据，法院依据《规约》第 50 条指定专家进行实地调查，收集水雷的数量和型号、埋雷的方式及时间等信息。最终，法院依据专家的调查结果和结论确定阿尔巴尼亚政府对雷区的布置是知情的。See *Corfu Channel Case (United Kingdom v. Alban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49, pp. 16 – 22. 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的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海洋划界案中，双方当事国对划界的起点存有争议。为确定划界起点，法院依据《规约》第 48 和 50 条主动指定专家进行实地调查，以查明双方当事国提议的划界起点处的海岸情况。最终，法院依据专家收集到的地理信息确立了划界的起点。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Caribbean Sea and the Pacific Ocean (Costa Rica v. Nicaragua) and Land Boundar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Isla Portillos (Costa Rica v. Nicaragu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8, pp. 147 – 148, 173, paras. 10 – 17, 86.

四 当事国聘请的专家对信息和数据的处理

专家在获得原始信息后,需要处理和分析这些信息。采用何种方法与模型等处理原始信息是专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很多案件中,双方当事人都曾围绕处理原始信息的方法、模型等展开辩论。例如,在某些活动案的赔偿阶段,关于采用什么方法来估算环境损害的价值,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存在争议,前者主张使用“生态系统服务法”(ecosystem service approach),后者主张使用“重置成本法”(replacement costs approach)。^① 法院也仅在某些活动案中对双方当事人间的此类争议作出了直接的回应,在其他案件中则采取了回避的处理方式。^②

法院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直接回应,可能是出于如下考虑。一方面,国际法院是一个司法机关,法院最基本的属性是“法律之庭”(a court of law)和“司法之庭”(a court of justice)。^③ 法院的任务是通过法律方式解决争端,依据国际法断定判决所必须查明的事实。^④ 关于这一点,肯尼斯·基思法官(Kenneth Keith)在纸浆厂案发表的特别意见中曾指出,“法院的任务是在决定当事国是否违反其法律义务的过程中去解决那些不得不解决的事实争议。”^⑤ 因此,法院在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根本没有必要解决当事国之间有关处理原始信息的模型、方法等问题的争议。另一方面,法院不是科学组织或机构,从科学技术角度解决双方当事人有关模型和方法等技术问题的争议不是法院的职责。^⑥

然而,随着法院受理和审理的科学与技术事实密集型案件越来越多,单纯回避的做法可能难以满足实现良好司法的要求。在未来的案件中,法院可能需要直接在应采用的信息处理方法和模型等问题上作出判断、给出答案并说明理由。本文认为,法院可以强调在有关技术问题上是否存在国际通行做法,如果有通行做法,应该鼓励当事国尽量采用通行做法。通常情况下,当事国很少对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产生争议。^⑦ 若不存在国际通行做法或不存在唯一通行做法,法院可在综合考虑个案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决定采取何种方法,且应给出相应的理由。某些活动案的赔偿阶段就是这种情形的典型案件。在该案中,鉴于国际法上没有规定环境损害赔偿的特定方法,还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情况,法院没有选择哥斯达黎加主张的“生态系统服务法”,也没有使用尼加拉瓜主张的“重置成本法”,而是决定采用“综合评价法”(overall valuation approach)来评估哥斯达

① See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Compensation Phas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8, pp. 15, 16, paras. 45, 49.

②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是法院采取回避做法的典型案件。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Nicaragua v. Colombi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2, pp. 642 - 643, 644 - 645, paras. 30 - 31, 36 - 38.

③ *Nuclear Tests (Australia v. Franc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74, pp. 270 - 271, para. 55; *Case concerning the Northern Cameroons (Cameroon v. United Kingdom)*, 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63, p. 29.

④ Shabtai Rosenn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1920 - 2005*, pp. 168 - 174; Andreas Zimmermann,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Commentary*, Article 38, pp. 55 - 75; Yuval Shany,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64 - 168.

⑤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Argentina v. Uruguay)*, Judgment of 20 April 2010,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Keith, I. C. J. Reports 2010, pp. 121, 124, 125 - 126, paras. 2, 8, 11.

⑥ See Shabtai Rosenn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1920 - 2005*, p. 169.

⑦ 通常情况下,当事国很少对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产生争议,典型案件是空中喷洒除草剂案。See *Aerial Herbicide Spraying (Ecuador v. Colombia)*, Written Proceedings, Reply of Ecuador, pp. 143 - 145, paras. 2. 189 - 2. 190.

黎加遭受的环境损害。^①这种方式较为灵活，能够使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各种具体情况等；^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在采取这种方式评估环境损害时虽然给出了原因，但是并未说明如何得出最终的环境赔偿金额，这引起了不少法官和学者的批评。^③

五 专家意见的结论

在处理完原始信息后，专家会得出相应的结论。如果这些结论是科学界的主流观点或者为科学界所公认，法院将特别关注并赋予权重。例如，在捕鲸案中，在论证“JARPA II 研究计划本应该包含一些非致死方法的可行性分析”这一结论时，法院引述了曼格尔和尼克·盖尔斯（Nick Gales）两位专家表达的、已经在科学界达成一致的科学意见。^④然而，对于曼格尔先生提出的“科学研究应该包含4种必要特征”的科学意见，法院则认为，“这些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某一位专家对所谓的设计良好的科学研究的看法。”^⑤在“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案”（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中，法院指出，没有受到公正之人质疑的证据会被赋予权重，^⑥能得到科学界广泛认可的科学意见恰好就具有上述特性。^⑦

如果专家意见的结论不利于当事国的立场，法院也会给予特别关注，并在判定实体问题或作出判决需要时赋予该专家意见以较大权重。^⑧在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尽管英国政府在1947年划定边界时认为杰拉达岛（Qit'at Jaradah）不是岛屿，^⑨法院仍然判定该地物可被视为岛屿。法院所依赖的关键证据是卡塔尔聘请的专家提供的不利于卡塔尔的专家意见，即不能从科学上证明杰拉达岛是低潮高地。^⑩法院在判定这类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时，采用了类似于对“高级政治官员及

① See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Compensation Phas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8, pp. 15, 16, 17, paras. 45, 49, 52.

② See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Compensation Phas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8, pp. 22 – 23, paras. 79 – 81.

③ See Jason Rudall,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 Compensation Owed by the Republic of Nicaragua to the Republic of Costa Rica”, (2018) 112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88, pp. 289 – 290, 292;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Compensation Phase, Judgement of 2 February 2018,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Bhandari, pp. 3 – 4, paras. 10 – 12;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Donoghue, p. 7, para. 32.

④ 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4, pp. 269 – 270, para. 137.

⑤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4, pp. 255, 258, paras. 74, 86.

⑥ See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Ugand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5, p. 201, para. 61.

⑦ See Lucas Carlos Lima, “The Evidential Weight of Experts before the ICJ: Reflections on th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Case”, p. 632; Shotaro Hamamoto, “Paradoxical Role of Experts in th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Case*”, p. 358.

⑧ See Lucas Carlos Lima, “The Evidential Weight of Experts before the ICJ: Reflections on th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Case”, p. 632; Joan E. Donoghue, “Expert Scientific Evidence in a Broader Context”, pp. 383 – 385; Shotaro Hamamoto, “Paradoxical Role of Experts in th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Case*”, p. 351.

⑨ 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1, pp. 98 – 99, para. 192.

⑩ See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1, p. 99, para. 195.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大陆架划界案”（突尼斯/利比亚）中。See *Continental Shelf (Tunisia/Libyan Arab Jamahiriy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82, p. 50, para. 52.

领导人声明”的证据判断方式,^①即这些不利于自身立场的声明或意见“可被解释为某种形式的承认”,^②可使行为人摆脱利害关系的束缚,增加证据的可靠性。

最后,对于双方专家都认可的科学结论,^③法院也会赋予很大的权重。^④从理论上说,证据的职能是帮助法院发现并挖掘真相;但在实际情况中,诉讼程序的启动可能仅仅是通过发现相对的真相而达到解决争端的目的。这不仅体现在国内司法程序中,也体现在国际性法庭查明事实的过程中。^⑤为达到解决争端的目的,法院可能认为“合意”要比“科学真相”更为重要。^⑥

六 结论

随着科学和技术事实密集型的案件日益增多,准确认定相关的争议事实已成为国际法院不得不面对的一项重要挑战。其中,在当事国聘请的专家提供的专家证据方面,国际法院的过往司法实践和相关判例表明,当事国所聘请专家的资质、专长和独立性以及专家意见所依赖的信息和数据的来源、处理方式和得出的结论等既是当事国在专家证据可靠性和证明价值上争辩的焦点,也是法院评估专家证据证明价值时着重考虑的因素。

鉴于当事国聘请专家是其自身主导的事项,国际法院既不会仅基于当事国专家的资质、专长和独立性等肯定或否定某项专家意见,也不会强制要求当事国聘请的专家必须满足某些具体条件或相关要求。相较而言,国际法院更为关注专家意见本身。尽管法院在既往司法实践中尚未就专家证据所依赖的信息和数据的来源、处理方式和得出的结论等因素对证据证明价值的影响,发表过一般性的观点或具体的意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因素不会影响专家意见的证明价值。事实上,法院往往会考虑当事国专家意见依据的原始信息和数据的来源,收集的技术标准、方法、模型,时间、地点和数量以及仪器、设备、工具等因素;在评估专家对原始信息、数据的处理分析情况时,法院着重考虑的是信息、数据的处理方法和模型。至于专家意见的结论,法院会考虑这些结论是否是科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否利于当事国立场以及是否为双方当事国专家所认可,等等。期待法院未来可在具体案件中就本文提及的相关问题直接作出判断并说明理由,亦可通过发

^① Se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86, p. 41, para. 64; *Armed Activitie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 Ugand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5, p. 201, para. 61;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v. Serbia and Montenegro)*,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07, pp. 130 – 131, para. 213.

^②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86, p. 41, para. 64.

^③ 例如,在捕鲸案中,双方当事国的专家都认为“JARPA II 研究计划为单个研究项目确定样本数量的过程缺乏透明性”,法院多次依据该结论认定事实。Se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Australia v. Japan; New Zealand intervening)*,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4, pp. 275, 283, 292 – 293, paras. 158 – 159, 188, 225. 再如,在某些活动案中,双方当事国的专家均认为“(疏浚)项目不会对科罗拉多河(Colorado River)的流量产生实质性影响”,法院据此确认了这一事实。See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and Construction of a Road in Costa Rica along the San Juan River (Nicaragua v. Costa Rica)*, Judgment, I. C. J. Reports 2015, p. 707, para. 105.

^④ See Lucas Carlos Lima, “The Evidential Weight of Experts before the ICJ: Reflections on th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Case”, pp. 632 – 633; Joan E. Donoghue, “Expert Scientific Evidence in a Broader Context”, pp. 383 – 385; Shotaro Hamamoto, “Paradoxical Role of Experts in th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Case”, p. 351.

^⑤ See Durward V. Sandifer, *Evidence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pp. 1 – 3.

^⑥ See Lucas Carlos Lima, “The Evidential Weight of Experts before the ICJ: Reflections on the Whaling in the Antarctic Case”, p. 633.

表一般性意见等方式，引导当事国的相关实践，在满足良好司法需要的前提下，提高证据和事实查明的工作效率。

Evaluation of the Probative Value of Party-appointed Expert Opin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Kong Lingjie and Liu Congcong

Abstract: Party-appointed expert evidence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act-finding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 variety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independence, qualification and expertise of the experts, raw data and information, the processing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by experts and the derived conclusion, have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y the Court in assessing the probative value of expert evidence. The Court has not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he independence, qualification and expertise of experts, since the Parties enjoy discretion in the designation and appointment of party-appointed experts. In a majority of the cases, the Court has not addressed the impact of various factors on the evidentiary weight of the expert evidence presented by the parties. Nor has it made general observations as to how the party-appointed expert evidence should be evaluated. A proactive approach could be taken by the Court in the future cases to respond to the points of contention between parties and to set out more detailed rules concerning the assessment of party-appointed expert evidenc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arty-appointed Expert, Expert Opinion, Evidentiary Weight, Expert Evidence

(责任编辑: 何田田)